

江元起：创办栖霞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

□张荣起

如今，提起美丽乡村，栖霞的国路乔、后许家村可谓远近闻名。同时，两村的带头人常建富、王进军也声名远播。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，每一个时期、每一个地方，总有一批先进代表在前面开路、树立典范，然后面上开花。70年前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，这样的先进典型也不鲜见。栖霞市接官亭村的江元起，带头创办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就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典型人物。

百家姓氏聚成一个大家庭

接官亭村坐落于胶东革命烈士陵园所在的英灵山左下方，发源于牙山的清阳河从村前流过，连接青岛、烟台的204国道（一级路）从村侧通行。据传，早些年此处并无村庄，因地处官道要冲，明代成化年间，知县路真在此建亭，接待朝廷巡视地方的官员，被称为接官亭。后来有些无家可归的人常在此处过夜，渐渐地，有些租种周边地主土地的佃农就在亭子附近搭棚寄住，流离失所之人也凑过来，或搭棚，或掏窑洞居住下来。这里的简易草房不断增多，日久形成村落，取名接官亭村。遇上荒年，拉家带口流浪到此村落户的人也渐次增加。村民来自四面八方，真可谓百家姓氏聚成一个大家庭，所以接官亭村从无排外的风气。据统计，全村增至百户时，有35个不同姓氏，增至125户时，其中94户是一担筐篾挑过来的。

贫农陈显德是泰安大选庄人，被生活所迫，只身流落到烟台拉洋车，整天奔波于大街小巷，也挣不出养家糊口的钱。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此时，他的家乡又遇灾荒、遭兵祸，一家人实在活不下去，妻子刘淑美只好带着一男二女三个孩子投奔他而来。不用说，烟台是养活不了他们一家大小的，听说桃村周边是抗日根据地，他们便一路乞讨来到接官亭村，在村南一个废弃的砖瓦窑暂住下来。这里虽是根据地，但土改之前穷人仍无地可种。陈显德靠给地主扛活勉强维持生计，未成年的儿子给人放羊补贴家用，即便这样也不敷出，妻子刘淑美时常带着女儿乞讨。后来带头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江元起也是赤贫户。他的祖籍是即墨，先祖何时逃荒过来的，他也不说清，只知本人是1908年出生于接官亭村，一家人辈辈世世给地主扛活，过着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的穷日子。1941年，许世友将军挥师解放了牙山，建立了牙山抗日根据地，贫苦农民才有了翻身做主的希望。

响应号召建起互助组

因群众基础好，抗战爆发前，接官亭村就有地下革命工作者。他们以打短工、做生意为名，进村开展工作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，建立党组织，动员青年参军参战。为了早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去，村里先后建立起各教会、青教会、儿童团以及民兵组织。埋地雷、打游击，是他们经常进行的抗日斗争形式。在村周边，日本侵略者两次踩响了地雷，被炸死炸伤数人，村民还活捉了一名日军士兵。

1942年，抗日民主政府在土桃村召开贫雇农翻身动员大会，接官亭村有14名贫雇农参加，大会号召“穷苦人民团结起来，为改变穷困生活而斗争”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、增加工资、算旧账、反恶霸等群众革命斗争。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，在减租减息斗争胜利的基础上，又进行了土改复查运动，农民彻底翻了身。这些斗争和运动，对全村的农民尤其是青年人是很好的历练，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分子，孙久红、鲁学海、江德显、朱家林、梁全、江元起等就是在运动中相继加入组织的中共党员。为了让翻身农民迅速摆脱穷困，改变生产方式成为当务之急。

1945年，胶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接官亭村设立了农业研究会，江元起担任研究会主任。他带领群众改良品种、科学种田、发展生产、增加收入、支援前线，并响应民主政府号召，采用变工、插犂（意思是指两家或几家农户合用牲口、农具，共同耕种）及季节性互助合作形式，适当解决了劳动力薄弱、缺大农具、缺牲畜农户的困难，有力推动了农业增收。1947年，江元起根据中共中央“组织起来”的方针，带头组织了7户常年互助组，共有土地50余亩、牲畜4头、犁4张、耩两犂、耙两盘。他们发挥集体智慧，合理安排劳动力，采用或实验科学的种植方法，硬是在山瘦瘠薄的土地上，头一年就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，一扫互助组刚成立时的“互助组要吃大锅饭”“入组不自由，有事得请假，整天受江元起管”等风言风语。江元起正确贯彻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，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，克服了许多困难，当年粮食平均亩产250多斤，比单干时增产30%。在1948年前方战事吃紧又遇灾事，农村劳动力极缺的情况下，江元起的互助组既动员青壮年支援了前线，又保证了粮食不减产，充分显示了互助组的优越性，坚定了他们继续办好互助组的信心。

江元起互助组的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，而一些未入组的农民仍处于半饥饿状态。当得知因体弱多病不能参加劳动的江登云吃不上饭时，江元起主动登门问寒问暖。他把上级发来的救济粮——50斤大豆送给了江登云，互助组拿出地瓜秧帮他栽了5亩地瓜，又帮他种了2亩花生，江登云一家深受感动。秋天，江登云家的地瓜、花生都丰收了，互助组又帮他收回了家。江登云亲眼看到集体的力量，当年主动参加了互助组。

除了江登云，在江元起的帮助下走出困境的苦难户还有许

多。江元起把互助组办得风生水起，把别人的困难看成自己的责任，不仅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，对全村的生产影响也很大。1948年，共产党员刘温也组织起一个互助组，两组并肩作战，互相竞赛。到秋天一盘算，江元起领导的互助组更高一筹。江元起受到了上级政府的表扬，年终参加了县里（时属牙前县）召开的劳模大会及农业增产大会。江元起带上4斤重的大地瓜和近2斤重的玉米棒，向全县的农民兄弟介绍了丰产经验，引起轰动。

1949年春，江元起以县劳模的身份参加了在益都县召开的华东农业会议。会议提出了“地瓜当家、花生赶集”“多锄一亩地，多打一成粮”的口号。接官亭村在江元起和刘温的带动下，又有好多群众被组织起来。大家集思广益，完善了组织结构，制定了合理的分配原则，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。

1949年秋，胶东遭受了罕见的台风侵袭，山里的高秸作物全部失收。而江元起等互助组按照党的要求把春地全部种上了地瓜、花生，不但没受损失，反而获得了大丰收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翻身人民欢欣鼓舞，斗志昂扬，江元起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。当年，江元起出席了山东省政协会议，年终又参加了县劳模大会，被奖励耕牛一头。他把牛交给互助组，让大家共同使用。

四户半合作社引发办社高潮

1950年，土改结束后，确立地权，签发土地证，农民吃上了定心丸。在此基础上，江元起重新整顿了互助组，合理分配当年的收入后，又添置了一些新农具和畜力，使集体经济再次壮大，成为全县农业生产的一面旗帜，也是胶东地区的先进典型。1951年，江元起光荣地出席了全省工农劳模大会，当选为省人民代表，先后去北京、陕西等地参观学习。他还以全国劳模代表的身份，参加了赴朝鲜慰问团，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。

1952年春，江元起出席了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高层会议，学习党中央关于“组织起来发展生产”的方针。江元起对比了一下，合作社比互助组更有共同富裕的保障，当场表态一定响应号召，走农业合作化道路，并与出席会议的本县劳模车福亭和文登县（当时威海范围属文登专区）全国劳模张富贵挑起了带头办社竞赛。

回村后，在莱阳地委（当时烟台范围属莱阳专区）等各级领导的直接指导下，接官亭村开始酝酿办社。在党支部会上，江元起传达了上级的会议精神，提出了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任务，让大家统一认识。经过讨论，大家一致认为走合作化的道路才是农民致富的唯一出路。

3月份正是为全年生产做计划的关键时刻，江元起立即着手动员大家报名参与合作社。真要迈出第一步时，大家又犹豫起来，有人甚至说：“爹爹儿子还要家，张、王、李姓能搞到一块吗？”也有人说起风凉话：“大伙再也不用发展了，等着吃大锅饭就行啦！”也有几户参加过互助组的贫农强烈要求办社，并郑重声明：“别人愿不愿意我们管不着，反正我们要办社。”大家力推江元起当社长。最后，铁心要入社的有贫农江元起、江元祥、江德义、鲁学进，当初成立互助组时他们都尝到了甜头，如今办合作社更是义不容辞。中农朱庆林原本在刘温的互助组，也尝到过甜头。可是他心里明白，入社后土地、牲畜、农具归集体所有，秋后分配时，土地股分配少，而劳动力分配多，这样土地多就吃亏了，心里有些矛盾。于是，他采取了脚踩两只船的办法，入上几亩地试试风头，即便吃亏也伤不着筋骨。就这样，接官亭村四户半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诞生了。上级领导得知后，马上发来了贺信，表示支持，入社的群众更坚定了办社信心，表示非干出个样来给大家看看不可。

由于合作社的土地薄、工具不占优势，江元起不得不从科学种田上下功夫，发动所有劳动力一起出动，完成各项生产任务。正当大伙干得热火朝天时，村里有人说起风凉话：“你看人家的合作社到底是优越，连老婆孩子都上山了……”入社的个别妇女经不住讽刺，豁上不挣工分，也不出工了。江元起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议论，他深入民户说服动员，最终稳住了社员们的情绪。

在上级农技部门的精心指导下，农具不断更新，加上社员们的精耕细作，庄稼长势喜人，丰收在望，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初步显示出来。相比之下，单干户的庄稼长势大为逊色，他们打心眼里佩服，说风凉话的人也销声匿迹了。江元起抓住时机，组织女社员到农田参观。大家个个赞不绝口，从此“半边天”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。

消息不胫而走。很快，区、县的领导来了，他们还组织各村的前进农民来参观。为贯彻落实省会议精神前来考察的团体也络绎不绝。接官亭村四户半合作社的出现，如同一条爆炸新闻，传遍胶东半岛。

秋天到了，全村的人都关注着合作社的收成情况。江元起要求社员们精收细打，力求丰产丰收。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，秋粮全部入库。据统计，玉米平均亩产550斤，谷子亩产500斤，花生丰产田亩产820斤，地瓜亩产4000余斤。除交公粮外，余者分到各户，其中，江元祥8口家，分粮1万斤；江德义4口家，分粮1万斤；鲁学进3口家，分粮7500斤；江元起7口家，分粮8500斤；朱庆林3亩2分地，分粮1060斤。社员分粮之多，在接官亭村史无前例，社员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。与合作社暗中比赛的单干户孙茂成，玉米亩产210斤，相差300斤。在事实面前，孙茂成心服口服，毫不犹豫

地提出入社要求。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亩产和分配数目张榜公布后，其他群众也纷纷要求入社，不几天便报名83户，经上级批准，命名为“英灵山农业生产合作社”。挂牌那天，区党委书记带领各村党支部书记、区种子站长、农技站长、兽医站长、供销社主任等来到接官亭村祝贺。此后，远近前来参观、采访的更是令人应接不暇。在江元起的影下，邻近的石字线、高家庄、白马庄、上桃村、涝都、南埠、长沙堡等村，也相继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。轰轰烈烈的办社高潮，在牙山脚下迅速形成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在江元起办合作社不久后，本县唐家庄区车福亭、文登县张富贵所创办的合作社，同样辐射到周边村庄，办社之风形成席卷胶东大地之势。

合作社的活力势不可挡。至1953年，接官亭村的绝大多数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。经过几年的巩固发展，1955年秋，江元起又率先办起了五个村庄融为一体、规模大、势力强的英灵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她像一枝奇葩，绽放于英灵山下。

鲜果送给毛主席品尝

江元起的农业合作社方兴未艾时，又赶上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。华东局、山东省、莱阳专署相继下发文件，帮扶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，帮扶的对象包括兴办互助组、合作社早的村庄，接官亭名列其中，上级无偿拨给他们1200株苹果苗。此前，栖霞只有少数村庄的个别农户有果园，不成规模。这次上级一下子就帮扶全县（东西两栖）1.75万株苹果苗，开了栖霞大面积栽植苹果的先河。

接官亭农业合作社领到苹果苗后，江元起立即召开社员大会，社员们大于一冬春，共栽苹果树40余亩。为了把果园管理好，他们专门成立了果业技术队，加大了水肥及修剪等管理措施。四年后，苹果开始挂果了，有些较大的果树实累累，压弯枝头，煞是喜人。社员们赞不绝口地说：“这么好的苹果来之不易，都是江社长的功劳。苹果下树后，要先拣个大的，让江社长尝鲜。”这话很快传到了江元起的耳朵里。数月前他出席了全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，恰逢毛主席到济南视察，接见了全省劳模。江元起激动的心情久久难平，他被毛主席握过的手至今还暖乎乎的。他深情地说：“吃水不忘打井人，幸福莫忘毛主席。我们今天能收获这么大的苹果，首先要送给毛主席品尝啊！”社员们拍手赞成。江元起安排果园队遍山挑选，小心采摘，装在木箱里寄到北京，并写信感谢毛主席指引合作化的金光大道。不久，中共中央办公厅代表毛主席给接官亭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写来回信：“寄给毛主席的苹果和信都收到了，谢谢你们！此复，并致敬礼！”回信给了接官亭村的人们极大的鼓舞。从那时起，有关栖霞苹果献给毛主席和“接官亭的苹果皮薄、清脆、口味好”的赞语就在栖霞县内悄然传开。

教子务农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农村最缺乏的是知识人才。接官亭村需要一大批记账员、会计员、技术员等，却一员难求。直到1961年，江元起的儿子江德国初中毕业，江元起心里美滋滋的，觉得自家祖辈没出个念书的，如今终于有了中学毕业生，队上又添了个有文化的人。可江德国却认为自己念了九年书回家种地是给父亲丢脸。一天，江元起和江德国谈起了这件事，他以自身的体会教导儿子说：“我生在旧社会，一天书也没念。解放后，有了党的好政策，领导好农业生产。可是我沒有文化，遇到了很多困难。领导好农业生产，也要有文化啊！”听到这里，江德国也想起老师的话：做什么工作都有出息，就看抱着什么态度。他想：“父亲听了我的话，带头搞好农业生产，曾进北京见过毛主席。我就把志向立在农村吧！”江元起见儿子想开了，进一步鼓励他说：“这就对啦，旧社会我扛活捞不着念书，如今你能成为中学生，是党培养了你，你就应听从党的安排。你看咱社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，样样都需要有知识的人啊！”江德国听后说：“爹，您瞧好吧，我一定能成为种庄稼的好手！”

江德国回乡正赶上秋收秋种，他满怀信心地投入了生产中。江元起则当起了他的老师，手把手地教他干活。春节过后，队上要选拔青年到窑上烧砖瓦，江德国被选上了。到了窑上，不管是调泥还是摇机器，他都不含糊。出窑时，他看着一窑窑红彤彤的砖瓦，心想：我这不是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吗！

众所周知，《丰收之后》中的赵五婶的原型是栖霞北路家沟村的女党支部书记栾志香。可鲜为人知的是，其中也有江元起的影子。

就在江元起教子务农不久后，为迎接1963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话剧会演，山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蓝澄提前一年到胶东老区深入生活、搜集素材、创作剧本。胶东黄县（今龙口市）籍的蓝澄，战争年代做过党的地下工作，曾踏遍了栖霞牙山和艾崮山抗日根据地的村村落落。如今他重走当年路，先后采访了包括江元起、栾志香在内的十几个老村党支部书记，最后以北路家沟村栾志香领导社员闹水、整土地为中心情节，确立了《丰收之后》的剧名，塑造出了赵五婶这个典型形象。

江元起在英灵山下的这片热土上奋斗了70年，2001年溘然离世。他生前多次受到毛主席接见，他为社会主义事业默默奉献的精神，同英灵山一样，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。

邂逅胶东大鼓

□战军

记得很早以前，也就是我上学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一些盲人，拿着小小的乐器，穿行在社会的各个角落，如厂区门口、学校门口、公园里、集市中、人口稠密处。他们席地而坐，用最简单的乐器——小鼓、铜板、三弦，就边敲边击着乐器边唱了起来，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看。

这些盲人依靠这门艺术为生，有些单位特意聘请他们去说唱。小时候我不懂这叫什么技艺，只是觉得他们弹得特别好，铜板打得非常动听，唱得也清脆悦耳。虽然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了，但我觉得他们的心像明镜似的。那时我非常喜欢这些说唱艺人，常盼望他们到我们那个小山村表演。

自从从那座小山村走出来后，我发现这些艺人辗转于社会各个角落。很多都是老夫老妻，他们手里拿着一个钵孟，提着二胡或者三弦，找一块石头坐下，就开始演唱起来。歌曲委婉悠扬，如天籁一般，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围过来。有时候一个曲目就长达一个多小时甚至两个小时，听众直呼过瘾，刚听完一段又吆喝再来一段。热心的观众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和开水让他们吃喝，这样一天就在热闹中度过。

有些盲人有自己固定的地方，熟悉他们会的人会按时过来听。盲人说唱的曲目几天一换，仿佛有唱不完的歌。我常听到的有《吴越春秋》《锋剑春秋》《东汉》《西汉》《隋唐》《平东莱》《月唐》《残唐》《天门阵》《明英烈》等，简直是琳琅满目。有些是他们自己编写自己演唱的。这些艺人还是很有文化底蕴的，让我耳目一新，也学到了很多历史典故。

后来这些说唱盲人慢慢地不见了，再也看不到他们绘声绘色的表演了。因为没了他们的表演，生活好像出现了空白期。尽管电视上佳丽如云、帅哥似模，节目精彩绝伦，但在我心里，这些都比不上盲人表演的节目。

正当这些老艺术家即将从我的记忆里抹去的时候，机缘



盲人艺人正在表演胶东大鼓。赵巍巍/摄

巧合下，我在横山书院再次遇见他们了。那天，我路过这个名叫横山书院的地方，一看是一个看书的地方，就进去了。一进门，我看见里面坐着很多人，他们背后的屏幕上写着“栖霞胶东大鼓”，边上写着“加强文化遗产保护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。四位盲人正襟危坐，左手拿着铜板、右手拿着木锤，前面放着一个小小鼓。每个人都穿着大红袍，戴着墨镜，等人到齐了，就开始表演起来。

悠扬的声调一出来，我就知道我找回了少年时期的我，又找回了那些街头艺人说唱的韵味和情调。主唱穿着紫红色长袍，外翻着宽十厘米的白袖口，一手拿着木锤敲着面前的小鼓，一手拿着两枚铜板轻摇手指，两枚铜板碰撞出悦耳的轻音符。伴奏的三个盲人固坐在他身后，双手抚着三弦，随着鼓点拉出有胶东味的弦音，如细长的流水声，缠绵不绝。

原来坐着的我，被这魅力吸引住了，忍不住站了起来，找了个僻静的角落细细地听。此时拿铜板的艺人突然有节奏地敲起了小鼓，铜板的音顿时密集清脆起来，伴奏的三个人也把三弦拉得让我的感情随之起伏。随着鼓声的奏起，一曲发源于胶东大地的夹带着栖霞原生态方言的歌声，开始回荡在小小的房间里。歌声就像一条曲曲弯弯的绵长的小溪流，随着故事的跌宕起伏而舒缓自由。刹那间，那声音如天籁般凌空而舞，如金声和玉声的和音，又如丝和竹的交织，情急处鼓声飒飒满籁跃，入逢喜事金雀来。听得观众如他乡遇故知，金声玉振满堂彩，又像金榜题名时，口吐莲花夸不休。

就这样，一段说唱节目整整持续了两个半小时。演出高潮一个接着一个，观众的掌声一浪比一浪高。第一个人说唱完了，第二个人又开始了，而且节目越来越精彩。我享受着这期而遇的文化大餐，倍感胶东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。